

“生态文明建设”笔谈

编者按：生态文明建设是践行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基于此，本刊邀请栾亚丽等专家教授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笔谈。栾亚丽指出中国共产党首次将“生态文明”写入党代会的政治报告，是党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党对社会主义文明认识的深化与提高，彰显党对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考量与升华。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建设的基础、政治文明建设的价值目标、精神文明建设的理性诉求和社会文明建设的精神动力。为此，应加强生态文明教育，提高全民生态文明意识；推广科学合理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倡导绿色、低碳、节俭的生活方式等，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层面上进行相关制度安排和实践探索，从而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黄正泉认为，农村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具有多重价值。当前农村生态文明发生了深刻的危机，必须加强农村生态文明的学术研究和理论建设，着手农村生态文明机制建设和农村“生态人”的培育。李红琼着重探讨了湖湘传统生态价值观的演进历程。她认为，湖湘传统生态价值观凝结了湖湘土人立足湖湘热土的基本生活智慧，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最初萌芽于早期的土著越蛮文化、炎帝神农文化及后期的巴楚文化之中。进而生成于两宋时期，是理学、道学、佛教生态价值观共同作用的结果。以此为基础，明清以后，尤其是近代，在王夫之、曾国藩为代表的士人的推动下，湖湘传统生态价值观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生态文明；和谐社会；农村；湖湘文化；生态价值观；建设路径

中图分类号：F323.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2013(2012)05-0001-15

Pen talk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Editorial commen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the internal requirement of practicing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and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We invited three experts to discuss the issu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From the angle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power, Prof Luan Yali thought that it i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hought on Marx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the value consideration and elevation on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marks the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ist civilization since the CPC led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to congress's political report. She interpreted the connot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clarifie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material civilization, spiritual civilization, political civilization and socialism civilization. Hence she presented the path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so as to impro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Prof Huang Zhengquan pointed out that the rur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as the foundation of constructing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He thought it was a high time to carry out the theory study on rur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cultivate more rural "ecological human" since a deep crisis was appearing in rur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rof Li Hongqiong mainly discussed the sprouting, development and formation of Huxiang traditional ecological value. In her view, Huxiang traditional ecological value was the basic wisdom based on Huxiang areas, and it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Huxiang culture. It initially germinated from indigenous Yue-man culture, the Yan Emperor Shen Nong culture and the Bachu culture. Then, as the result of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the Confucianism, Taoism, Buddhism, it was formed in the period of two the Song Dynasty. On this basis,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especially in modern times, those elites represented by Wang Fuzhi, Zeng Guofan put Huxiang traditional ecological value into full play.

Key wor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armonious society; rural area; Huxiang culture; ecological value; construction path

和谐社会语境下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栾亚丽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

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1]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将“生态文明”写入党代会的政治报告，标志着党执政兴国理念的升华和新发展。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如何理解生态

文明建设提出的理论意义?生态文明建设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价值如何?笔者试图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视角对此做出探索。

一、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的理论意义

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对于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1) 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是在批判现实基础上指向未来的,在人与自然的的关系上,马克思认为:“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都是“人的生活 and 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2]自然界本身不是人的身体,但它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这就是说,“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2]人作为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一刻也不能离开自然界而生存,所以人应该尊重、爱护大自然。恩格斯也曾宣称:“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3]人对自然改造的实践构成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正是在社会实践中实现人与自然统一的属性。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生产力获得了飞速发展,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资源消耗过大,不可再生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的困扰。这些问题正制约着我国社会建设的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是党从我国社会建设实际出发,注重生态环境建设,保持生态平衡,不仅体现社会建设实践的务实精神,还体现党和政府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所追求的一种高境界的文明程度,更体现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从而成为我国从工业文明向更高境界的生态文明过渡过程中的指导思想。

(2) 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标志中国共产党对社

会主义文明认识的深化与提高。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文明的认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逐步推进的。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政治文明,并将它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并列,构建了“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将社会建设列为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格局由“三位一体”发展为“四位一体”。党的十七大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概念,尽管没有明确其战略地位,只强调它的重要性,但“生态文明”已经作为战略任务得到全面实施,并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相并列,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使我国现代化建设布局由“四位一体”发展为“五位一体”。这表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党对社会主义文明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3) 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彰显中国共产党对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考量与升华。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毫无节制地消耗自然资源,破坏了生态环境和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诉求,极大地限制经济社会的发展,使许多区域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瓶颈。这些矛盾和问题促使中国共产党必须从价值论高度重新审视发展战略,不能再以牺牲环境和浪费资源为代价,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出一条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优美、经济快速发展的新路子。鉴此,党作出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科学发展的价值抉择。

生态文明建设注重人、自然、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这与科学发展观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在自然、政治、经济、文化之间形成协调统一状态是一致的。生态文明要求坚持以人为本,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之路,依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确定生产方式和生产规模,解决资源环境问题,不仅使经济做到持续、健康发展,而且也会求得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全面发展。只有生态文明抓好了,才可

以为经济建设提供环境前提保证,带动促进其他文明的发展和进步。所以,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是党对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考量和升华。

二、生态文明及其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价值

从词源学考证,“生态”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其理解不尽相同。在西方,生态一词的英文为“ecology”,源于希腊文oikos,意指家、房子、栖息地。“生态”这一概念,最早由德国生物学家E.海克尔于1866年提出,是指自然界中生物为了生存彼此间的互动关系。

在我国古代典籍中不乏关于“生态”思想的描述和记载。《周易》中有:“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4]《尚书》载有“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5]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写道“天人之际,合而为一。”^[6]这三处描述蕴含着遵循天地相宜,才能达到天、地、人的和谐的道理。我国古代典籍中的“生态”一词,最早见于南朝梁简文帝的《箏赋》:“丹萸成叶,翠阴如黛。佳人采掇,动容生态。”《东周列国志》第十七回对息妫容貌的描述时有:“目如秋水,脸似桃花,长短适中,举动生态,目中未见其二。”^[7]

“生态”本义是指“生物之家”,即自然界的生物或生命现象的家园和住所,是由生物和非生物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所构成的一个动态协调的完整系统。文明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尺。“生态文明”则是人类实践中遵循自然、人、社会协调发展规律而取得的物质成果与精神成果的总称。生态文明理念的出现是人类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注重保护环境,并使二者在生态层次上达到统一。因此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生态文明:

(1)生态文明是人类所享有的一种文明成果。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一样,是一种文明成果。“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又主动保护客观世界,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的关系,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

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8]人类走向工业文明后,伴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出现了温室效应、资源枯竭、土地荒漠化与沙漠化、人口爆炸、粮食危机等全球性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严重地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人类对此进行理性反思,寻找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建设一种新的文明形态,那就是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之路。正如人类分别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领域获取好的成果后上升为文明形态一样,人类改造生态环境所取得的良好成果则被视为生态文明,这是人类影响自然界的积极方面,是人类与自然互惠共生,实现自然、社会、人类永续发展的最佳选择。

(2)生态文明是人类与生存环境间的平衡状态。人类在改造自然获取生存和发展物质的同时,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其中的积极方面是指:“把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起来,即建立人与自然相互协调发展的新文明。”^[9]这种状态表明,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应以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共存为价值取向,实现自然生态平衡与人类自身经济发展目标相统一。社会生态系统达到良性运行,社会各种关系相互和谐,人类的一切活动既能满足人类本身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又能做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3)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美好境界。生态文明的核心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这一理念的宗旨是“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人要象爱自己一样爱护自然,决不能无节制地开发自然来满足自身的需求。它要求人们在价值取向上从过去的“征服自然”转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增长模式上从过去的以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向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转变;在发展观念上,从过去的把增长简单地等同于发展,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转变。为此,人类不应单纯地去向自然索取,更不能肆意掠夺自然,而要实行生态人道主义,用文明而非野蛮的方式对待大自然,这样才有利于保护人类家园,做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社

会环境和谐统一,否则将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对此,恩格斯曾给出经典的诠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0]

中国共产党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建设相同重要的地位,使生态文明与四大文明协调推进、和谐发展。因此,生态文明建设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内在要求。

(1) 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建设的基础。自然界为人类从事物质资料生产,发展生产力提供了物质基础。只有保护好生态环境,才能确保生产力获得持续、健康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支撑。因此,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生态环境,是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旨归。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我们走出过去以单纯发展经济为中心的误区,遵循经济建设行为的生态化、绿色化、无害化原则,将经济发展速度与生态可承受度相结合,把生态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增长点,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之路,从而实现生态文明进步和物质文明发展的“双赢”。只有这样,才能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使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

(2) 生态文明是政治文明建设的价值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这就要求将生态文明贯穿于政治文明建设之中,成为政治文明建设的指向和价值诉求;将解决生态问题、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党和政府政治工作的重中之重。从执政的视角,将生态建设成就作为考核政绩的主要内容,要求各级干部树立生态政绩观。政策、法规的制定着重解决生态问题,力图寻求代际之间协调平衡发展,既能满足当代人发展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利益,以保证生态文明的建设与发展,使生态文明建设成为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要求的新的政治价值形态。

(3) 生态文明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理性诉求。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所追求的发展不仅要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更重要的是诉求为人类精神生活开辟一片新天地。生态文明的发展能帮助我们改变过去那种“人可以无节制地开发和利用自然”的错误观念,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误区,形成新的生态文明理念和生态文明意识,倡导“绿色精神文明”。所谓绿色精神文明,“是一种高度关注生态环境的精神文明,它始终将生态环境的优化作为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内容,作为精神文明的价值追求目标。”^[11]这样,才能使人们能够在生态和谐、环境优美、心情愉悦的条件下工作与生活,建设真正的和谐社会。

(4) 生态文明是社会文明建设的精神动力。社会文明建设,主要是通过动员社会力量,整合社会资源,发展以民生为核心,包括教育、医疗、就业、保障、分配等方面工作的社会事业,构建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环境。为达此目的,就应在全社会树立绿色消费、节约资源的生活理念,将日常工作与生态标准结合起来,关注弱势群体,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实现社会公正。加强社会事业建设,形成健康、文明、科学、和谐的生活方式,使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价值观深入人心,真正为建设高度的社会文明提供内在精神动力。

三、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策略

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1]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当代中国文明发展规律的客观反映,是在经济建设中不断提升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形成的理论新成果,从而使建设生态文明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层面上进行一系列有利于推进生态文明的制度安排和实践探索,从而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1) 加强生态文明教育,提高全民生态文明意识。当前,面对日趋恶化的生态环境,生态文明道德观教育应提上议事日程,尤其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观念教育。胡锦涛曾指出:“要牢固树立人与自然相和谐的观念。自然界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

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建设自然就是造福人类。要倍加爱护和保护自然,尊重自然规律。对自然界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利用不讲建设。”^[12]由此,应首先加强全民的生态文明和生态道德教育,提高对生态文明建设重大意义的认识,使人们在思想上从传统道德观向生态文明道德观转变,提高对生态环境的道德意识,树立对自然的伦理道德关怀。在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能够自觉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把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自然资源有机结合起来,并把它做为人类对自然界应履行的道德义务与责任。同时,还应加强全体公民的生态文明的法治教育,通过普及和宣传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章,增强公民依法建设生态文明意识,使生态文明观在全社会得以弘扬。

(2) 推广科学合理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全球化,因此,加强研发与设计,推广科学合理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是解决当前生态危机的基本途径。所谓循环经济是指在生产过程中,通过科学合理的设计,废料循环再利用,变废为宝,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它可以提高原材料的使用率,降低物质生产对自然资源的消耗速度,清洁生产,减少污染和浪费。正如马克思指出:“生产排泄物即所谓的生产废料再转化为同一个产业部门或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新的生产要素;这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这种所谓的排泄物就再回到生产从而消费(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的循环中。”^[13]早在上个世纪,有的国家和地区就已经开始倡导和推广循环经济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达到了既发展经济,又保护了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目的。随着人们生态意识的加强,党的十七大对循环经济做出了新要求:“开发和推广、替代、循环利用和治理污染的先进适用技术,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保护土地和水资源,建设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1]

当前,我国大力提倡科学的循环经济发展模

式,是在不影响自然生态系统循环的基础上,遵循物质与能量循环原理,以产品清洁生产、资源循环和高效回收利用为基本途径,以减量化、再利用、多次循环为生产活动的行为准则,实现自然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方式,实现环境污染的零排放或低排放,达到保护环境实现经济发展的目的,从而将经济活动融入到自然界的物质再生产过程中,实现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的有机结合,维护整个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

(3) 倡导绿色、低碳、节俭的生活方式。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要求我们,应从现代生态价值观高度看待经济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既不要被当前接踵而至的危机所吓倒,悲观厌世,又不要对各种危机熟视无睹,盲目乐观,而应适时地转变观念,采取积极有效的、切实可行的防治措施与对策,充分发挥产、学、研相结合的优势,努力研发、利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倡导绿色、低碳和节俭的生活方式,促进生态自我修复。绿色、低碳和节约的生活方式是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之一。绿色低碳追求低消耗,要求人们节约资源,使用符合环保要求、有利于资源的再生和回收的绿色产品。这种消费方式既可以提高资源利用率,缓解资源供需矛盾,又可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保护生态环境,能够做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节俭的生活方式要求人们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是我国具体国情决定的,我国资源从总量上来看是大国,人均却是资源小国。我国人均矿产资源、耕地面积、水资源和森林蓄积量分别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2、1/5、1/4和1/10。以水资源和能源为例,我国可利用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6位,人均占有量2340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居世界第109位,被列为世界13个贫水国家之一。我国有300多个城市缺水,其中严重缺水城市108个。然而,我国工业重复用水率仅20%-30%,单位产品用水量比发达国家高5-10倍。^[14]

概言之,未来几十年,资源问题将成为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我们应按照资源的可承受程度进行合理生产、合理消费。“必须把建设资源

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1]为此,全社会应大力弘扬绿色、低碳、节俭的生活方式,每个公民应该从自身做起,从身边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在动态平衡中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

参考文献:

- [1]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0.
- [2] [德]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7.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4-375.
- [4] 周易[M].郭彧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62.
- [5] 尚书[M].顾迁注释.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133.
- [6] 董仲舒.春秋繁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60.
- [7] 冯梦龙.东周列国志[M].武汉:长江出版社,2006:80.
- [8] 邱耕田.三个文明协调发展: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基础[J].福建论坛,1997(3):24.
- [9] 李红卫.生态文明——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J].社会主义研究,2004(6):114.
-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 [11] 陈少英,苏世康.论生态文明与绿色精神文明[J].江海学刊,2002(5):45.
- [12] 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04-04-05(1).
-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09.
- [14] 邹丽芬.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系[J].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6(9):25-26.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12JD710073)、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L11BKS013)、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L11BKS007)阶段性成果,作者系辽宁师范大学副教授,清华大学哲学博士后。)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与路径

黄正泉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发展方式、消费方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排放物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是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我国是一个古老的生态文明的国度,然而现代工业的发展使其陷于前所未有的困境,特别是农村生态文明更是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为此,笔者拟在简要分析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与现实挑战的基础上,探讨农村生态文明的建设目标与路径。

一、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多重价值

人类所处的世界是一个生态系统,人类是其中的重要成员之一。马克思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1]自然存在物,有生命的存在必然形成生态。什么是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相互转让、和谐共生的关系。生态文明是层次性更高,外延更宽的文明。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形态看,生态文明是独立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之外的新的文明样式;从横向的人类社会文明体系看,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并列,构成一种新的文明体系;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成果形式而言,生态文明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所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从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互动关系而言,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升华。总之,生态文明是人类对传统文明进行理性反思的产物,包含了人本性、历史性、和谐性、文化性、伦理性等,是一种生态智慧,是解决人类生存之学。

农村生态文明是人们在农业生产与生活时,主动、积极地改善农村内部自身发展和优化农村与自然、城市关系,建设良好的农村生态环境所取得的一系列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农村生态文明是“生态文明”中的一个子系统。人与自然的和

谐是农村生态文明的本质特征和核心价值理念。农村生态文明的物质成果主要是指生产、经济的发展以及自然条件的改变；精神成果主要指农民生态观念与意识的产生与增强、农民精神面貌的改善、农村生态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程度(指精神方面)等。农村生态文明是整个生态文明的一个巨大的子系统，是区域性的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

农村生态文明的建设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和谐共生，是人的生命之门。文化生态建设是生命之门的建设。“迄今为止，人，建立世界，就是建立门。”生态文明就是“门”，“门”是人生存的母胎。“门”是利用自然之物而建的，即有这片树叶才有了“门”。“人被赶出了伊甸园之门，是因为夏娃用一片树叶建立了自己肉体的即自然的门户。这片树叶不仅把人同自然隔开，同时也把女人同男人隔开。在没有这片树叶之前，人同自然是一体的，亚当同夏娃也是一体的，无所谓进出，也无所谓生死，否则，伊甸园不会安宁。就算是智慧吧，它的第一个运作就是建立门，即用一片树叶遮住阴户。”^[2]这片树叶多么地不简单，它是一片生命，一片智慧，是生命智慧，也是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生存智慧，生存智慧不仅要处理好人与物的关系，还要“建立”世界。在农村，农村的世界即农村的生态文明，农村生态文明是一种具有特色的区域性生态文明，农村生态文明既是农村社会发展的基础，又为农村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没有农村生态文明的平衡、协调发展，就没有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没有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加快推进，就没有农村社会的健康发展。只有健康持续发展，“树叶”才不会枯黄凋谢；没有农村生态文明的变革，就没有整个生态文明的发展。农村生态文明是人居住的“伊甸园”，生态文明的建设就是伊甸园的建设。

二、农村生态文明的现实挑战

生态智慧并非一种“域外价值”的强行移植。我国是一个农业生态文明绵延不断古老的帝国，经过 50 个世纪，得以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有许多不同能级的生态文明系统和理念：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人与社会的关系协调一致、人与人

的关系亲情友爱、人与自我的关系压抑欲望知足常乐。我国古代的农业生态文明是一种伦理道德性生态文明。强烈依赖环境的农业生产方式、相对隔绝与封闭的居住方式、重复稳定的经验和情感为主导的日常生活模式等，使我们的祖先“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王维《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就是主体情趣与山水田园相契合的和谐农业生态文明的写照。

中华民族在思想上历来崇尚“天地人和”、“阴阳调和”、“天人合一”的思想，把热爱土地和保护自然融入到生态文明之中。早在公元前二千五百多年，先人就开始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活动，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德国著名思想家施韦兹对我国“天人合一”的思想表示由衷的赞许与敬佩，认为这种思想以深刻的直觉思维体现人类最高的生态智慧。在古老生态文明演进的过程中，农村生态文明成为我国生态文明的一部分，并在实践上创造了完善的有机农业生产模式，桑基鱼塘生态农业模式以及修筑梯田保护土地的做法等。爱护自然和保护自然和顺应自然(道家)不仅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哲学思想、道德要求，而且成为“圣王之制”和“王者之法”。这些思想已成为中华民族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核。

中华民族生态文明的核心观点是人类与自然之物是统一的。《庄子·知北游》：“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3]“达万物之理”就是要“筑造栖居之所”(海德格尔语)。“栖居之所”就是生态的诗意表达。人的终身劳作就是在筑造这栖居之所。我们祖先几千年来在长江、黄河流域形成和保持了世界上最早的稳定而简单的农业生产行为方式，形成了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和狭小而封闭的生活空间。所形成的生态系统具有稳定性、成熟性、封闭性等特征，是一种典型的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结合，理想追求与现实存在的统一，形成了自然而然的独具特色的生态文明。但她又是非常脆弱

的,难以经受“工业文明”洪流的冲刷。随着现代工业化的发展,当下我国田园缺少了几分诗意,“天人合一”几成梦想,农村生态文明正面临以下严峻挑战:

人与自然关系层面上:森林毁损、水土流失严重,尤其20世纪中叶森林的无度砍伐造成的严重创伤迄今未能痊愈;水资源缺乏,耕地退化,土地沙漠化、石漠化严重,土地开垦、机械化以及化肥农药的过度使用使耕地发生质变;工业的发展使水土资源既紧缺又被严重污染(工业废水);气候日益暖化,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人与社会关系层面上:人与社会相脱离,社会使人边缘化,农村大量的优秀青年涌入城市而城市又使他们成为局外人;城乡社会保障不平衡,农民自然成为弱势群体,都市化、数字化城市使市民处在最下层;社会的城镇化、现代化,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农村社会不再是传统封闭的、稳定的社会,竞争这头怪兽虎视眈眈地望着农民;农村社会的边界在扩大,封闭的空间被打破,部分成为城市的附庸、原料产地和垃圾倾倒地。

人与人的关系层面上:年轻人进城打工,空巢家庭的老人谁来管?养儿防老,人老无人管是农民最担心的问题;家庭教育缺乏主体,有父母生无父母教是人与人关系的首要问题;二元社会结构,市场经济出现加深农村人与人的矛盾,社会的变化使人感情疏远,人情淡化,关系复杂;人口众多,消费水平相对上升,物质发展导致道德水平下降。

人与自我关系层面上:社会文化的发展,城乡差别的加剧,贫富差别的拉大,导致村民心灵不平衡;物质的丰富,生活水平的提高,生存问题上升到生活的意义问题,村民新的价值观的出现同时萌发了反文化情绪;生态意识薄弱,亚文化大量的存在,如封建迷信观念的根深蒂固,千万年形成的自然生活状态无所谓生态意识;道德滑坡,精神缺失,等等。总之,农业文明转化为现代文明后,最核心的问题是道德问题。现代农村生态文明问题不少,形势严峻。我国农村社会已经不是昔日的“桃花源”,农村生态文明系统出现了严重的失衡。

三、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与路径

生态文明是一个意义系统,“种种意义”就构成了文明,我国当前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构建一个新的意义系统。马克思认为,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构成人与自然日益统一的历史过程,应当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作为人类认识和实践的终极价值尺度;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要突出人的作用。生态文明不仅要求人与自然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使之更适应人类生存和发展,更要求实现人与社会、人际之间的和谐关系。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环境资源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的社会经济政策为手段,致力于构造人与自然和谐和发展的文明形态。

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思想指导行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大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等建设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的战略目标和一系列新思想,无疑是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指南。但生态文明问题不是自然问题,而是人的思想文化问题。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是农民,因此,有必要基于农民视角提出更加具体的行动纲领和“口号”,如坚持科学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坚持实现公平、正义,合理分配资源,不断改善生活条件等,以利于调动广大农民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明确生态文明建设指导思想的同时还必须明确提出以下建设目标:大力推进生态建设,恢复和谐的自然生态系统,合理开发自然资源,实现资源永续利用;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大力弘扬生态精神,倡导文明生活,以“生态人”培育为核心,构建农村数字化生态文明系统;改变农村面貌,建设美好家园;最终实现人——社会——生态文明三位一体和谐共生。

要实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必须选择正确的路径。路径选择也就是生态文明的运行之道。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系统工程。我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文明大国,各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经济发展水平、文化生态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这就决定了我国各地区农村生

态文明建设路径具有地域性、独特性、多样性。因此,各地农村生态文明如何建设,从哪些方面开始建设,以什么样的途径建设,需要我们从整体上、动态的角度来思考,尽管如此,笔者认为我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以下基本路径:政府推动——生态文明保护路径;制度建设——生态文明治理路径;生产发展——生态文明保障路径;科技发展——生态文明质量路径;城乡统筹——生态文明友好路径;多元发展——生态文明协调路径;弘扬传统——生态文明继承路径;改善条件——生态环境优化路径。并建立以下运作机制:政府主导——构建文明绿色行政体系;生产发展——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科学发展——重塑农村生态文明目标;绿色生活——改变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和谐共进——统筹城市生态文明布局;多元发展——强化地域生态文明特色;文明自觉——发展构建民间生态文明组织;生态重建——建设农村数字化生态系统。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植根于现实的奋斗,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实际行动。路径正确与否固然关系到目标能否实现,但目标的实现还必须在以下重点环节取得突破:

首先是农村生态文明的学术研究和理论建设。在对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中,虽然涌现出一大批成果,但译介国外的偏多,本土化的偏少;解读文本偏多,回答现实的偏少。农村生态系统这一生命之网极为复杂,其“种群之间彼此建立起复杂而严格的关系”还不为人知悉,需要深入研究其内涵;要深化对西方生态文明理论、我国农村生态文明演进历程、农业生态文明特色的研究,传统的生态文明的思想智慧与实践,明确哪些可以继续?哪些可以发展?哪些需要批判否定?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历史文化根据和理论支持;要坚持理论研究与现实紧密联系,克服历史虚无主义、金钱万能主义和技术至上思想,深入分析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途径选择和迫切需要解决的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矛盾等一系列问题,为理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经济与政治关系提供理论依据。

其次是加强农村生态文明机制建设。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如何借鉴国内外生态文明建设

的经验,探索并逐步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已成为当务之急。发达国家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包括强化政府责任,综合运用多种环境经济政策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制订生态经济发展的科技支撑体系,协调城乡生态经济的和谐发展,实现经济转型;重视培养和提高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规范公众的行为。在生态文明建设运行机制方面,如美国的政策调控机制、德国的循环经济发展机制、日本的“绿色新政”机制等。我国虽然已经启动生态文明村建设等工程,但这些机制远不能满足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农村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一套强有力的、分工明确、符合农村实际情况与农民需求的生态文明建设机制,如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城乡合作协调机制;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评估与监督机制;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激励与惩罚机制;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创新机制等。农村生态文明是城乡统筹生态文明和谐的建设。城乡统筹的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涉及到城市各个领域。运用生态学的观点充分考虑区域自然环境条件的可能性,对社会价值观、道德伦理观、经济模式、生活方式及政策体制等社会文明进行重新定位,从而对整个城市系统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空间结构等进行改造、创新和重构,使其发展建立在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良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之上,处理好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生产与生活、各部门不同层次的现实与未来的关系,创造一个安全舒适、清洁美好的生态环境。英国学者曾提“田园城市”概念,城与乡如同磁铁是相互吸引但又相互独立的关系。城市是人工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两者互为环境。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建立起城乡之间在功能上互利互惠、相互促进与相互制约的双向因果关系,实现城乡生态系统的整体效益,包括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

第三是加强农村“生态人”的培育。人是生态文明之根。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涵盖了各个方面,而其中最主要的应当是“生态人”的培育。农民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培养农民的生态文明意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生态人”的培育要坚持本能无意识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文化无意识与

伦理道德和谐统一；社会文化意识与生态机制和谐统一；内在自由意识与生态意识和谐统一。将广大乡民培养成新时代的“生态人”这完全是可能的，广大乡民有着“生态人”的文化基因。千百年来农民依自然节律生产、生活；在依血缘关系的自然秩序中形成社会关系；在依自在自为的日常生活中形成日常思维，具有“天人合一”的文化本性。随着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农村城镇化，经济全球化等，这使本来非常脆弱的农村生态文明出现了危机，生态文明的危机最终是人的危机。因此，“生态人”培育的重要任务是加快生态文明意识、生态伦理意识、生态理性意识、生态责任意识、生态保护意识、生态法律意识、生态审美意识的培育。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与生态文明相关，都是对生态文明的建设或者破坏。当把生态文明的精神变为广大农民的游戏规则时，不仅农村生态文明就一定会建成，而且“生态人”也一定会形成。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95.
- [2] 张志扬.门：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277.
- [3]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650.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BSH015)、湖南省农村文化基地建设委托项目阶段性成果，作者系湖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湖湘传统生态价值观的演进

李红琼

生态价值观是人们对生态价值的认识与态度，是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发生关系时对生态环境在人类活动中的作用与地位所持有的看法和态度。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包含有丰厚的生态智慧^①。长期以来，人们都不断从内在的价值追求中自觉不自觉地维护湖湘生态圈的整体性和完整性，促进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湖湘传统生态价值观的萌芽、生成与发展就存在于这样一个悠长的历史

与久远的传统之中。

一、湖湘传统生态价值观的萌芽

生态智慧的最初产生是伴随人的产生，在人与自然的交往中自然萌发的。湖南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旧石器时代，其境内便有古人类繁衍生息，是原始稻作农业的发源地之一。

1. 湖湘传统生态价值观萌芽的历史文化背景

可考的湖南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出的大量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如南托大塘、鹿芝岭月亮山、河西黄家洲、槐树坪等表明，原始聚落首先在湘江两岸渐次展开。

除本土文明外，上古传说中的炎帝南徙葬于酃县，舜帝南巡韶山，韶乐引凤的故事，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那时的湖南与中原有着一定的联系。到青铜器时代，湖湘便融入到逐渐形成的楚文化之中。楚文化无疑成为后来湖湘文化的源头之一。据古文献记载，湖南原为越人等“蛮”族居住地。《湖南风土记》就有云：“茅芦为室，颇杂越风”。原住民越人与三苗蛮族信鬼神，好巫蛊，天性浪漫、质朴、直率而多情。春秋战国时，随着楚国征湘，楚人、巴人相继进入，并逐渐成为湖南境内的主体民族。这些最初的先民在争取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过程中，逐渐萌发出对大自然的最初意识，构成湖湘传统生态价值观的初步萌芽。

2. 湖湘传统生态价值观萌芽的地理条件

湖南东南西三面环山，土壤以强酸性的红壤为主，虽作为中华腹地，却是南北战略要冲，加上名山名水荟萃，风景优美，人杰地灵，夺天地之造化，历来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和众多文人关注之地。向北敞开的地貌特性，有利于冷空气的长驱直入，受东亚季风环流影响，其大陆性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非常典型，光、热、水资源丰富，具备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但多雨潮湿，气候变化无常。冬寒夏热，春温多变，春夏多雨，秋冬干旱。这使得此地水旱灾害多，还常以“东坡土开坼，西湖水渍田”的奇特景观著称。“地势下湿，山林毒气。”瘴疠横行，生活条件恶劣。正因为如此，才催发了先祖们求生存的坚强意志。在与天斗、与地斗的过程中，人们必须在有限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努力维护农业生产

的自然生态条件,这就萌发了湖南人最初的生态价值观意识。从生存实践的层面看,“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1]可见,湖湘传统生态价值观传统的开端,正是建立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的农业文明的基础之上。

3. 湖湘传统生态价值观萌芽的表现形式

萌发状态的湖湘传统生态价值观主要存在于先期的土著越蛮文化、炎帝神农文化及后期的巴楚文化之中,其影响又尤以后两者著称。其最初特征,最典型的莫过于对自然神灵的崇拜。

(1) 炎帝神农文化生态价值观。此时的人们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获取自己的生存空间。传说中,“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2]以及神农氏“日中为市”等等,这些在今天都已经为大量考古发现所证实。有人将炎帝神农文化生态价值观的基本精神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喻兼有天和大地品格。但也由于知识的不足,先民们对周围的环境充满了恐怖和神秘,于是产生了原始的图腾崇拜。同时也出于对祖先的尊重和趋吉避凶的考虑,古代湖南人的观念里普遍存在着一种鬼神信仰的思想,“巫鬼文化”成为湖湘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譬如,“长沙”这个地名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据语言学家、历史学家考证,“长沙”一词来自于远古时代,曾在湖南、广东、广西生活过的一个原始荆蛮部落,他们信仰原始的宗教女神。为了祭祀女神,筑沙为台。所谓长沙,就是祭祀原始女神的地方。“巫鬼文化”还体现在屈原楚辞及发掘的诸多战国楚墓文物中。当时的人们普遍相信有一个与人间现实世界相对应的天上神仙世界和阴间鬼灵世界。依据长沙楚墓出土的帛书及屈原《楚辞》,可以得知湖南先民一是信奉自然神,如日神东君、云神云中君、风神飞廉、雨师薄号、水神、山神等;二是信奉英雄神,最突出的为伏羲、女娲、炎帝和祝融。这些说明当时的人们因为生存的艰难而产生出对大自然的敬畏。

(2) 楚文化生态价值观。湖南作为南楚之地,是楚文化的重要腹地,楚文化无疑成为后来湖湘文

化的源头之一。楚人给湖南带来了中原的文献典籍,这些文献典籍被刻在青铜器上和书写在简牍与帛书上,在湖南广为流传,其所传播的当时北方较为先进的生态价值观念,突出地表现为中原的阴阳五行术数学说与老庄的道家思想。

阴阳术数思想于湖南地区表现充分。人们认为天干地支、四季年月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而神秘的联系,它影响着人们的生死、婚丧、仕途升迁、战争胜败等一切世俗事务。由此,湖南盛行占卜术。楚墓帛书中就有“卜问吉凶”之语,并详细叙述了一岁中灾异的趋避、祭祀的禁忌,表明当时的人们以封筮来卜问神灵有关生老病死、婚丧、战争等现实生活行为的吉凶。

楚文化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两位,其一是道家创始人李耳,即老子,著有《道德经》,其“尊天道而重自然,尚阴柔而贵无为,明变化而保本性”的学说理念,是以丰富多彩的楚文化为背景孕育而成的,既是楚文化的提升,又形成楚文化的核心。老子哲学的核心思想是“道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说,把宇宙看成一个自然产生、自然演变的过程,天地万物是依照自然规律发展变化的,而“道”是本源。其后发展起来的庄子思想,则彻底地追求精神自由,有着浓郁的诗性特征,相对宽容和超脱,并以其独特的空灵、旷达、大度、狂傲与独立,对湖湘传统生态价值观的最初萌发,乃至以后的长期发展,都给予了重大影响,成为湖湘传统生态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二是屈原。相传作于湖南的《天问》,对宇宙、自然和历史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和质问。这种精神后来深深扎根于湖湘文化的土壤之中,也成为湖湘传统生态价值观的重要来源。

二、湖湘传统生态价值观的生成

如果说湖湘传统生态价值观萌发于楚文化之中,那么,其生成则应是伴随着两宋时期大规模的移民造成的中原北方儒家与佛家文化南来所致。

1. 湖湘传统生态价值观的生成背景

秦汉以后,因为铁器、牛耕的普遍应用,农作物品种增加,湖南在粮食供应上已不仅仅满足内需,而且还能大量外调,所以有所谓“长沙,楚之粟也。”^[3]到魏晋南北朝开始,北方连年分裂战乱,

人口大量南徙。因为移民的进入,湖南人口激增,大量荒地开垦,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三国时,“长沙好米”已是名声在外。隋唐五代时期,湖南茶叶每年上交的茶税以百万计,湖南茶甚至已压倒江淮茶和福建茶,垄断了北方市场。农业的发展带动了工商业的繁荣,如以粮食为原料的酿酒业就特别发达。

在垦殖开荒、谋求生存的过程中,人们开始朦胧意识到人类对其赖以生存的自然过分索取与干预,将影响到人类的生存环境;意识到自身与周围环境不可分的关系;开始注重粮食生产的生态环境、天地人三者的协调等。与此同时,在文化相对比较发达的中原地区,已经形成比较系统的生态价值观的早期内容。在中原儒家思想、佛教思想中从来都不曾缺乏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思考,这些思考随着南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对湖南开始形成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成为湖湘传统生态价值观生成的重要资源与主要内容。

2. 湖湘传统生态价值观的生成过程

靖康之乱以后的南宋,有名的文人均在南方从事文化教育活动,浙江、江西、湖南、福建等省成为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学派,建立了许多著名的书院,形成两宋时期的一个重要学术现象,即所谓“儒学地域化”。其中湖南道州人周敦颐,创立了理学基础,大大发展了孔子的理论,成为湖湘文化的思想起源。南宋文学家、理学家、大学士胡安国及其子胡宏,于南宋建炎年间来到潭州湘潭创立碧泉书院,并在衡山麓办文定书院,吸引众多湖南才子来求学,并就此形成湖南学派。此时张栻也随父到长沙定居,拜胡宏为师,成为胡宏的得意弟子,其学术思想较之乃师更胜一筹。张栻的名声之大,还引起了另一位大学者——朱熹的注意,由此导致了学术史上著名的“朱张会讲”。“朱张会讲”以及朱熹在岳麓书院的讲学,几乎成为湖湘文化的精神象征,湖南成为独具特色的“理学之邦”。岳麓书院也因此被比之孔孟之乡的“洙泗”、“邹鲁”,潭州则从此有了“潇湘洙泗”的美名。从此,湖湘士民在人口、习俗、风尚、思想观念上均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而组合、建构出一种新的湖湘区域

文化形态。此后的湖湘文化开始出现截然不同的两个层面。其一方面,岳麓书院讲堂所悬的“道南正脉”匾额,显示着湖湘文化所代表的儒学正统。无论是周敦颐、张南轩,还是王船山、曾国藩,他们的学术思想、学术追求,都是以正统的孔孟之道为目标。另一方面,在一般的民风民俗、心理特征上,则主要源于本土文化传统,依然保持着荆楚山民刚烈、倔强的个性。这两种文化组合相互渗透,再加上此时的佛教、道教也都在此获得迅速传播与发展,共同对湖湘传统生态价值观的形成发生作用。

3. 湖湘传统生态价值观生成的渊源

此时的湖湘传统生态价值观的生成,是理学、道教、佛教生态价值观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主要内容自然也表现于这“三家”之中。

(1) 理学生态价值观。湖南作为理学重要发源地,理学生态价值观就成为湖南生态价值观的重要特色,也标志着湖湘传统生态价值观的初步形成。其中主要代表人物有周敦颐、胡宏、张栻等。他们探讨人性之理,认为心性论离不开万物,如张栻就认为湖南学派的特色主要是“先察时后涵养”。^[4]

周敦颐著有《太极图说》、《通书》等。《太极图说》参考道教思想而以儒学为本位建立了一个宇宙论系统,认为宇宙万物的生成:“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5]万物皆由“太极”而来,太极生阴阳两仪,两仪交感而生五行,这五行在空间之中流行变化,而化生万物。另外,周敦颐的《爱莲说》也影响至巨。其中“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5]天人相感,人与物之性通的思想跃然纸上。胡宏也认为:“万物皆性所有也,圣人尽性,故无弃物。万物生于性者也,万事贯于理者也。形而在上者谓之性,形而在下者谓之物。观万物之流形,其性则异;察万物之本性。其源则一。”^[6]胡宏将“性”作为万物生成的本原,性生成了气,“性为气本”,^[6]天地由性而立,从而将心性论上升到天人合一的高度。张栻继承胡宏“性”的学说,

认为万物一体，同源于一性。但又有所不同，他认为性既有物性也有人性，强调人性与天地之性一样都是善的。他还认为心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心也者，贯万事统万理而为万物之主宰者也。天地变化草木蕃，亦吾心体之本然者也。”^[4]这就很有湖南人的味道了。

(2) 道教生态价值观。道家道教在湖南有着源远流长的深厚根基，作为南方楚文化的一项基本内容，其在湖南的流行与影响程度可想而知，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献就能充分证明此点。以后，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清谈玄学之风也盛极一时。湖南当时颇有名气的清谈家和玄学家有长沙人虞授、邓粲等。他们都崇尚“老庄”，提倡“安于陋巷”，“避世山林”，终身隐而不仕。由于崇尚“老庄”和清谈玄学之风的盛行，与之相近的道教在湖南得到广泛传播。

道教对天地自然的基本看法大多来源于道家。道家对天地自然的关注与思考，尤以老庄表达得最明了，即道为本原，道生万物；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主张贵柔守雌，弱以胜强，向往回复“纯朴”的至德之世。道家一直把宇宙大自然看成是有意识的生命体，认为万物各有其性，“天地之性，万物各自有宜。”^[7]应该顺应物性，让万物自然发展。“随造化之物性，顺自然之本性，无容私作法术，措意治之，放而任之，则物我全之矣。”^[8]反对人欲横流，对自然宇宙的过度干预，强调维持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和谐。但道教同时也认为，“我命在我不在天”^[9]。人的命运不由天地决定，而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强调后天努力的重要性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但也不能突破道的范畴。如果说儒家在天人关系上强调“自然的人化”，那么，道家则以“人的自然化”为特色，强调通过对自然之道的依傍，使人达到一种心性的逍遥游。

(3) 佛教生态价值观。佛教传入湖南在魏晋之际，传播较广的主要是禅宗和净土宗，其中又尤其是以禅宗影响为最。禅宗的基调就是“空”。这意味着原先不争的事实，即自然的实有，受到根本的怀疑和冲击，甚而至于将自然宇宙全然看空。在般若学看来，色即是空，透过色去悟解空，色界(自然)

成为解脱和超越的对象。与色的观念相联系，境的观念也被引入。佛教的境即涅槃，指佛教的最高智慧。诸法无相，智无分别，法空智空，统一于空。“夫圣心者，微妙无相，不可为有；用之弥勤，不可为无。不可为无，故圣智存焉。不可为有，故名教绝焉。是以言知不为知，欲以通其鉴；不知非不知，欲以辨其相。辨相不为无，通鉴不为有。”^[10]佛教从根本上否定自然、生命和时空的真实性，其结果是否定有情之生命，以达涅槃之境：“不以情累其生，则生可灭；不以生累其神，则神可冥。冥神绝境，故谓之泥洹。”^[11]自然被空化以后，心化之境开始达到一种以天地为庐，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境界。这种心造之境是一种真正的自由、超越与和谐。在超越中，佛教从不把自然当作征服的对象，也不远离自然，认为自然是人们出发的地方，也是人们回归的地方。这种生态美学智慧充满了人性的关怀与关照。在佛教那里，你可自由地欣赏常青之绿树，轻轻地抚摩芬芳之野草，静静地聆听清脆的鸟鸣，细细地呼吸和煦的春风，悠然地流连于山光水色之间。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境界中，人与万物众生别无二致，我即是物，物即是我。

禅宗的超然胸襟，最易与湖南的青山绿水融为一体。湖南向来在僧人心目中有别样的意义。在我国的“渔隐文化传统”中，由禅僧所创的唱和词“渔唱潇湘”富有典型。其中代表性的便以“本是潇湘一钓客”^[12]的湖州甘露寺圆禅师最为著名。他们精神上对潇湘山水的认同，除了清幽的山水外，还特别显示了他们的宗教情怀。禅师对潇湘山水的钟情，也影响到诗人，著名诗人陆游便有诗曰：“不到潇湘岂有诗”。于是，在禅宗思想影响下，众多士人来到山灵水秀的潇湘之间做真正的超然游。

三、湖湘传统生态价值观的发展

从元末明初到明末清初，湖南遭受数次战争创伤，人口大量减少，“十室九空”，大片土地和田园荒废，庐舍为墟，“只得招四方之民以实县”。^[13]明清时期，尤其是清康熙之后，湖南终于获得和平。在各种条件的会合之下，湖湘传统生态文化进入空前发展的新阶段。

1. 湖湘传统生态价值观的发展背景

清代的湖南开始单独建省,尤其是两湖科举的“南北分闱”,湖南不再依附于湖北。大批移民的进入,又最大限度地开垦了荒地,使耕地面积显著扩大。加上注重兴修水利,注重耕作方法的改进,推广双季稻,种植各种经济作物,使得清代湖南的农业生产发展超过了此前任何一个朝代。湖南气候适宜于农耕,加上长期的土地改造熟化,土地肥沃,人民勤劳,因而物产丰富,素称“鱼米之乡”。再加上交通的改善,“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谚开始变为现实。湖南不仅成为江南有名的粮食产地,也成为江南的谷米集散地,长江下游苏杭地区粮食也仰赖此地米市供应。^[14]至康熙后更有“湖南熟,天下足”^[15]之说。“止有本省之谷运出,从无别省之米运来。”^[16]随着粮食商品化的发展,湖南境内逐步形成了一批繁盛的谷米集散市场,俗称米市。湖南粮食生产的发达和米谷贸易的开展,使四方商贾云集,湖南经济、文化发展迅速。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因为垦殖过度,自然环境的破坏也在与时俱增,河流泥沙淤积,水旱灾害日见增多。人们在获取大自然馈赠的同时,也开始感受到大自然的另一面。

2. 湖湘传统生态价值观的发展过程与表现

从清初至民国的三百年间,我国社会急剧变革,湖湘士人在这重大的社会转型时期,站在文化变革的前沿,不仅推动近代湖湘文化发出耀眼的光彩,也在天人关系方面将湖湘传统生态价值观发挥到极致。

明末清初,湖湘文化中出现了一位杰出学者——王夫之。受岳麓学术传统的影响,王夫之对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史、百家之学以及释、道之学,都有研究并吸取。他认为气是天地万物的本原,世界统一于物质性的气,是阴、阳二者的统一体,所谓“阴阳者,气之二体,动静者,气之二几”,“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亦无间隙”。^[17]他把性理哲学的探讨和经世致用结合起来,将理学的基本范畴加以新的阐发,使之适应并推动了明末清初实学思潮的发展,为经世致用提供了理论根据。在他之前,湖湘子弟所推崇的先贤是周敦颐;在他之后,道光年间其著作由新化邓显鹤为之刊布

流传,于是他便取代周敦颐,成为湖南人所崇拜的新的精神偶像。谭嗣同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18]其后湖湘文化影响深远,孕育了湖南在近代现代史上一大批人才,为湖湘文化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湖湘文化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当然,从魏源到曾国藩、左宗棠,再到陈天华、黄兴、毛泽东等等,他们虽大多都以政治或军事成名,但他们也对自然,对生态有着自己的思想与见地。

其中,曾国藩更是作为传统湖湘文化的绝响,对湖湘传统生态价值观的进一步发展做出极大贡献。曾国藩先追随唐鉴讲习理学,后又兼治考据、词章、经济之学,对诸子百家各派学说亦采取兼包并蓄的方针,但总体以理学为核心,对周敦颐、张载尤为推崇。他认为,天地万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天下之道,非两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19]天地间的人与万物本同,都是由“太和絪縕、流行而不息”的仁、义二气生成的。“人也物也,圣人也常人世,始所得者钧耳”。^[19]但也有所不同:“人得其全,物得其偏。”^[19]这是典型的人为贵思想。而在天人之间,曾国藩认为其中的最大区别莫过于无限与有限。宇宙的时间与空间是无限的,人的寿命与见闻是有限的;知识和事务是无限的,人生所能读、能办者是有限的。他说:“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粒耳。”^[20]由此曾国藩深感人的渺小,极度信奉敬畏天命,认为人应该向天道学习。而在天道之中,最让曾国藩感慨警惕的,则是物穷则变,盛极必衰的道理,这也成为他的座右铭。但这并不排斥“有志竟成”,他也非常相信主观意志的作用,认为只要拼命去干,就能达到目的。“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唯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21]当然,人的努力也会有失败的时候,曾国藩对一切无法用“有志竟成”解释的问题,统统归

之于“天命”。在天命与人力之间，天命为主，人力为次。“古来圣哲名儒之所以彪炳宇宙者，无非由于文学事功。然文学则资质居其七分，人力不过三分。事功则运气居其七分，人力不过三分。”^[20]

曾国藩关于天、地、人三者之间的生态价值观念可以说是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湖南人的思想。正是这种思想促使一代又一代后继者一边敬畏天命，一边也能奋发图强，傲然自立于天地之间，无愧于天，无愧于地，更无愧于人，无愧于己。

总之，湖湘传统生态价值观凝结了湖湘士人立足湖湘热土的基本生活智慧，其自远古的萌芽到两宋生成，再到明清乃至近代的发展，历经曲折，其中有湖湘本土根基，更伴随有自古以来多次大规模移民与文化移植交融共生的结果，是湖湘传统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明显带有某些中华文化的普遍特征。当然，从文化发展的层累性角度来说，对湖湘传统生态价值观的研究，其意义显然不仅是历史的，更是现实的。

注 释：

①源远流长的湖湘传统生态价值观在自然与人的关系问题上强调天地一体、万物平等，以天地和谐为目标。这种生态价值观在强调整体的同时，也认为天大地大人亦大，拥有万物皆为我所用的傲然气势。

参考文献：

- [1] 司马迁. 史记·货殖列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2] 周易·系辞下[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 司马迁.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4] 钱穆. 朱子学提纲[M].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5] 周敦颐. 周敦颐集[M]. 北京：中华书局，2009.
 [6] 胡宏. 胡宏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7] 太平经合校[M]. 北京：中华书局，1960.
 [8] 成玄英. 庄子注疏[M]. 北京：中华书局，2011.
 [9] 葛洪. 抱朴子内篇·黄白篇[M]. 北京：中华书局，2011.
 [10] 僧肇. 肇论校释[M]. 北京：中华书局，2010.
 [11] 僧祐. 弘明集[M]. 北京：中华书局，2011.
 [12] 普济. 五灯会元[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13] 湘潭市地方志编辑委员会. 湘潭市志[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8.
 [14] 清实录(五)·圣祖实录(二)[M]. 北京：中华书局，1985：1047.
 [15] 清实录(九)·高宗实录(一)[M]. 北京：中华书局，1985：937.
 [16] 刘泱泱. 近代湖南社会变迁[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133.
 [17] 王夫之. 张子正蒙注·太和篇[M]. 北京：中华书局，1978.
 [18] 梁启超.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M]. 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16.
 [19] 曾国藩.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M]. 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1.
 [20] 曾国藩.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21] 曾国藩. 曾文正公家书[M]. 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1.

(本文系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JD31)阶段性成果，作者系湖南农业大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陈向科